



## 算术、语文学与犯罪的“滑稽剧”

——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看尤奈斯库的荒诞剧《上课》

陈 溪

**摘 要：**尤奈斯库戏剧《上课》既充满暴力色彩和荒诞意味，又极具语言哲学意蕴，但通常阐释偏重前者，将其视为对强权统治及其非理性机制的嘲讽和批判，却往往忽略其中独特而深刻的语言哲学内涵。对后者的考察可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形成意味深长的对应。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有关语言的意义和用法、数学逻辑与经验事实、“疼痛”的语法、“实指定义”与“交流呼告”等方面的论述，有助于深入解析《上课》中失败的“语言习得”过程，进而有效地阐释该剧中“算术导向语文学”、“语文学导向犯罪”的离奇逻辑命题。在这部关于犯罪的“滑稽剧”中，算术和语文学授课的荒诞过程和血腥结局，在语言哲学层面凸显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所警示的诸种思维陷阱，并揭示出在权力政治的表层关系之下，隐藏在语言和思维等方面的深层冲突机制。

**关键词：**尤奈斯库；《上课》；维特根斯坦；语言习得；算术；语文学；犯罪

从他的第一部戏剧《秃头歌女》开始，尤奈斯库(Eugene Ionesco)就特别关注语言、尤其是日常语言造成的荒诞感和疏离感。从《秃头歌女》那充满语言反思意味的对话，到《椅子》中“失语”的演说家形象，再到《国王正在死去》中那不断消散又不断延展的语言“身份”，尤奈斯库对于语言现象，尤其是“边缘”语言现象有着极为敏锐的艺术直觉和充满哲学意味的探索。正是这类独特的直觉与探索，不仅使尤奈斯库剧作在以语言变形实验为显著特性的荒诞派戏剧中仍然特立独行，而且可以启发我们质疑、反思和突破传统主流批评对于荒诞剧的惯常阐释模式，深入发掘或重新阐释荒诞剧的先锋价值。

在尤奈斯库为数众多的以语言为重要主题的荒诞剧作中，《上课》蕴含着对人类语言和思维困境最深刻的哲学思索和最独特的存在体验，而这一思索和体验又是通过某种原初的思维活动，即语言习得，而呈现出来的。上述特征不仅使得《上课》成为尤奈斯库戏剧中最具语言哲学意蕴的一部，而且从一个独特角度将尤奈斯库对于语言现象的涉及与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思想形成意味深长的对应。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特殊对应关系的解析，为尤奈斯库戏剧阐释提供一个新的视野。

### 一、《上课》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语言习得”

《上课》实实在在地表现了一次日常教学的全过程：中年男教授在自己家中给一位年轻女学生授课，先是数学，后为语言，其间一位能干而忠诚的女仆不停地介入、打断并试图调节授课过程中的紧张局面。教授与学生之间最初相互礼让，但随着授课内容越来越冗长严肃，以及学生理解的愈加困难，谦卑客气的教授变得越来越急躁、专制，最后成为嗜血的杀人凶手，在狂暴的嘶喊中将学生杀害。而我们从他与女仆的对话中得知：这已是他杀

害的第 40 个学生。

在传统阐释中,教授形象被视为沙文式专制暴政的象征,发生戏剧性激变的师生关系则被当做法西斯统治下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典型关系模式,而《上课》一剧理所当然地被诠释为反对暴力、反对非人性统治、探讨强权政治及其非理性机制,乃至直接影射纳粹政权的戏剧力作<sup>①</sup>。

本文在此无需避开这种鲜明的政治象征意义,并且承认,对于人类权力关系的探讨,无疑是该剧的重心。然而,有两个问题值得重新关注和思考:第一,在通向残暴结局的授课过程中,激变发生在语言习得环节,这是否意味着某些更加隐秘微妙的深层含义?第二,教授在帮助女学生努力拿到“博士学位”的教学过程中,不仅选择数学和语文学这两科进行启蒙式教育,而且,数学教学发生在语文学教学之前,这是否具有潜在的哲学暗示?

以上细节正是被传统阐释模式所忽略的,而这种模式在提供政治与人道的鲜明主题时,却难以充分解释更为丰富微妙的如下内容:数学和语文学的奇异关系、课堂作为故事场景的特殊意义、语文学怎样导向“犯罪”、语言暴力怎样导向行为暴力等。其实,这些有待探讨的层面早已向我们敞开意义之门,它们必须借助一个有力的支持——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烛照,才能获得崭新发现。

在“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中起中坚作用的维特根斯坦认为:所有哲学问题、思维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或语法问题。他的所谓“语法”,并非一般语法学上的各种规则,而是形态各异、多种多样的“用法”。他的后期哲学中被引述最多的一个命题就是:语言的意义在其用法<sup>②</sup>,这些用法的总和被称为“语言游戏”;并且“语言”家族呈现出开放性和多样性,某些平时不被从语言角度理解的事物,如数学,也可部分列入“语言游戏”活动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在探讨语言的意义亦即语言的用法时,有一个重要的分析路径:对语言习得过程的描述。其后期哲学代表作《哲学研究》的论述始于对奥古斯丁语言观的批判,而这一批判恰是从对语言习得过程的分析展开的<sup>③</sup>。语言习得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追溯一个语言游戏是如何被掌握的,因而是一种追根溯源的叩问。这一追问路径不是传统形而上的“本质追问”,而是研究这样一种语言游戏究竟如何形成,从而进一步探讨人们如何通过掌握一种语言来进入一种新的“生活形式”。

尽管维特根斯坦经常使用日常生活之例来提示种种思维误区,但是,进入一种新的语言游戏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所谓一种新的语言意味着新的生活形式,应该如何理解和想象?尤奈斯库对于语言问题的敏锐意识与生动呈现,为我们领会这一哲学内涵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的启迪。而在他的所有荒诞剧中,《上课》这一以“语言习得”中的困境为基本情节的剧作,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所探讨的语言游戏、语法规则、生活形式等问题以生动具体的方式真切地演绎出来。其中所蕴含的丰富深刻的语言哲学命题,长期以来,却由于我们对荒诞剧的阐释囿于存在主义模式而被视而不见,因此借助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来解析《上课》,将提供一种深入理解该剧的新视野。

对这种可能的分析极为有力的支持,以及对于其核心问题的暗示与隐喻,就在《上课》的文本中。剧中,对语言及相关概念的掌握过程,形成了某种冲突张力,成为“残暴”行为的前奏。一个细节颇能说明问题:剧中教授唯一不能残害的人物——女仆,有效地避开了这个语言系统对她的重要性和决定性,正如她自己清醒地认识到的,她不是教授的学生,不需要教授来赋予其语言、生活、存在以意义。我们不妨引述这位超离于暴力与伤害行为之外的女仆的一句话:“算术导向语文学,语文学导向犯罪”(Arithmetic leads to philology, and philology leads to crime.)<sup>④</sup>,并通过解析“算术”如何导向“语文学”,“语文学”如何导向“犯罪”这两个颇为离奇的过程,在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层面上进一步揭示这部剧作的内涵。

①相关论述参见 Vicky Unruh, "Language and Power in 'Miss Margarida's Way' and 'The Lesson'", *Latin American Literary Review*, 1983, 14(27), pp. 126~135, 以及 Jeanette Patterson, "Au Pire; Language, Violence and the Totalitarian Ideology of Origins in Ionesco's *La Leçon* and Césaire's *Une Tempête*", *French Forum*, 2008, 33(1-2), pp. 195~213.

②“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第 31 页。

③例如《哲学研究》5、6、32、244 等,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 5、6、24、133 页。

④Eugene Ionesco. *Four Plays*. Translated by Donald M. Allen. New York: Grove Press, INC, 1958, p. 76.

## 二、“算术”如何导向“语文学”

《上课》中对语言困境的揭示最为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像尤奈斯库或其他荒诞剧作家的大部分作品那样，从通常意义上的语言领域开始，而是从另外一个领域——数学的习得活动开始。借由数学这一特殊“语言游戏”的展开，一类根生于语言底部的本质问题逐次显现。《上课》中关于数学的“语言游戏”，只有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视野中才能显现出它与“语文学”和“犯罪”的特殊文本联系。

对于数学本质及其基础的思考在维特根斯坦哲学中具有重要地位<sup>①</sup>，它至少在两个思考路径上足以启发我们对于《上课》的阐释。首先，在维氏看来，数学的意义和本质已全部表达在具体数学活动中，表现在一系列游戏规则、表述形式、理解角度中，而各种概念、观念等并非其核心所在。例如他在谈到算术时说过：“当我们解释怎样演算时，我们并不需要一般的表达式。没有一般表达式的演算并非是不完整的；它只是另一种游戏。”<sup>②</sup>实际上，维氏将他对于哲学的语言分析角度也带入对数学的分析，并认为数学不过是语言游戏纷繁形式中的一种。

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虽将数学活动也看成一种语言游戏，但并非没有思考数学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的特殊性，即：数学并不是对于世界上某种独自存在的“事实”的发现和揭示，所谓“数学现实”，指的是符合，或者说在理解了数学命题和活动的情况下对于“现实”的一种解释和角度。简言之，数学虽与事实相关，但并非经验命题或真理表达。如问“这里的弹子是那儿的 100 倍吗？”不是数学命题，而“170 个弹子是 3 个弹子的 100 倍吗？”才是个有意义的数学命题<sup>③</sup>。相反，在很多被我们认为是“事实”和“经验”的事物上，倒是数学的语言游戏赋予了我们把它们看成“事实”的方式和能力：“‘知道这个声调作了多少次振动，那是很有意思的。’可是，只有算术才能教会你这个问题。它教会你去看这一类事实。”“我想说，数学不是简单地教会你对问题作出回答，而且用提问和回答教会你整个语言游戏。”<sup>④</sup>看到数学命题和数学活动是由各种规则、逻辑、算法和表达式等组成的“语言游戏”，同时也看到数学的“语言游戏”并不需要期待在经验事实中一一呈现，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对于数学既带有他的后期哲学特色，又揭示了它的独有“游戏”规则的分析。

应该说，《上课》中那位看似残暴的教授其实是位育人心切的“好”老师，他竭力向学生传授数学的“真理性”法则，然而他不断尝试与变更各种“语言游戏”的努力，却使他一次次更深深地滑入维氏哲学为我们警示出的思维陷阱之中。

授课伊始，教授执著于将计算的基本概念用描述、定义、阐释、逻辑推理等“形而上”的理论方式授予学生，而这些抽象教学非但不能使她迅速进入“语言游戏”过程，反而引起一系列啼笑皆非却又不无道理的误解：

教授：……哪个数更大？是 3 还是 4？

学生：……在什么意义上‘更大’？

教授：……大数比小数包含更多单位……

学生：包含单位最多的那个数就是最大的数？啊，教授，我明白了，你把质和量等同起来了。<sup>⑤</sup>

归纳和定义法失败后，教授开始隐约意识到一个问题——自己在纯形式、纯演算、纯公式的熟悉世界中布道，学生却在日常语言与数学语言的边界上陷入迷茫，怎样把学生从日常语言世界尽快引进数学语言领土，才是核心难题。于是，教授开始其第一次“形而下”的努力和妥协：采用更直观、更贴近生活的

①德国 Suhrkamp 出版社 1989 年出版的 8 卷本维特根斯坦著作集之 Ludwig Wittgenstein: Werkausgabe Band 6, 后为徐友渔和涂纪亮译成中文版的《论数学的基础》，作为第 7 卷收录于中文版 12 卷本《维特根斯坦全集》。见涂纪亮主编：《维特根斯坦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②D. Lee, A. Ambrose 编：《维特根斯坦剑桥讲演集》，周晓亮、江怡译，载《维特根斯坦全集》第 5 卷，第 370 页。

③参见叶闯：《数学：一种特殊的语言游戏——评维特根斯坦后期数学哲学》，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 年第 4 期。

④维特根斯坦：《论数学的基础》，载《维特根斯坦全集》第 7 卷，第 294 页。

⑤Eugene Ionesco. *Four Plays*, pp. 53~54.

方式说明。他找了 5 根火柴来说明  $5-4=1$ , 说火柴是“数”, 每根火柴“是一个单位……或者一个数字符号! 或者一个数!”, “1, 2, 3, 4, 5,” 是计数元素”<sup>①</sup>, 但这不仅没使学生离数学本质更近, 反而让她卷入一场更为复杂的“词”与“物”的对抗中。学生在这番引导下, 将“数字符号”、“数”、“火柴”、“单元”和“元素”等概念在实体意义上全部混同起来, 陷入更为混乱的实际语义联想中: “3 个 3 可以减去 2 个 2 吗? 4 个数可以减去 2 个数字符号吗? 1 个单位可以减去 3 个数吗?”<sup>②</sup> 老师沮丧地发现, 所有对于基本数学概念的静止定义和解释都被缺乏任何数学经验的学生以荒诞的方式摧毁。

维特根斯坦在分析“实指定义”时所举之例, 对我们理解上述剧情或许不无助益: 有人指着两颗核桃教人认字, 说“那叫做 2”, 被教者可能误以为“2”指的是核桃的名字; 反之, 给一组核桃起名时, 很可能“核桃”一词会被误认为是核桃的数目; 如果为避免误解而特别说明“这个数叫做 2”, 那么必须先教会初学者什么是“数”<sup>③</sup>。总之, 我们自认为只需将词与物对应起来就能实现的“实指定义”, 其实必须依赖背后已在发挥作用的游戏规则及联想背景。

作为训练有素的传授者, 教授当然对算术背后的规则烂熟于心, 但学生“掌握”的是一套截然不同的规则。她虽对基本减法一窍不通, 但当教授提出一道极其复杂的乘法难题 ( $3755998251 \times 5162303508 = ?$ ) 时, 她竟脱口说出正确答案。她对这一惊人事实的解释更令人惊叹: “我不依靠推理, 我把所有可能的乘法结果都背下来了”<sup>④</sup>。从这一夸张性情节可见, 教授所掌握并力图传授的, 是抽象的演算规则和推理逻辑, 而学生凭借的是离不开经验事实的记忆。两种游戏规则之格格不入, 在精疲力竭的教授的一句话中尽显实质: “记忆是数学的死敌。”<sup>⑤</sup>

有学者在分析《上课》时指出逻辑之不可或缺的两要素: 一是纯形式推演, 即句法 (syntax), 二是语义阐释 (semantics), 而《上课》揭示出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对于真实生活都有所欠缺<sup>⑥</sup>。在该剧中, 教授和女学生各执一端: 一个是纯形式的、逻辑推理的自足的封闭体系; 一个是非形式推理的、由记忆构成的开放体系, 也是与经验事实密切相关的语义联想体系。两个系统通过数学学习过程发生冲突和纠葛。在教学过程中, 教授最初陷入形而上学的概念解释, 失败之后又卷入与经验事实纠缠不休的混乱之中。

例如, 当教授发现学生无法进行有效的减法运算时, 便力图将数学概念融入经验事实来启发学生: 他先拿学生的鼻子和耳朵打比方, 给了几只鼻子、耳朵, 又减掉几只鼻子、耳朵, 后来觉得有违常识, 又以学生真实存在的十个手指为例, 但天真的学生仍不明白为何要减去几个手指。显然, 学生无法脱离现实生活来设想数学逻辑和理性, 对她来说, “扯掉鼻子”、“吃掉耳朵”、“砍掉手指”之类“减法运算”都是匪夷所思的可怕内容。根据维特根斯坦的理论, 语义是与其背后丰富的联想背景及“生活形式”密不可分的。教授既要借助语义阐释, 又完全无视这些语义引起的可怕的经验事实联想, 企图将其强行纳入纯形式演算之中, 因而陷入两难。

运算教学的失败使教授感到颓丧, “数学习得”活动在绝望的氛围中转向“语言习得”活动以寻求出路。教授曾试图传授的纯形式、没有内容、不引起意义联想、无关乎现实身心的数学, 不得不让位于包含语义的语文学。剧中, “算术导向语文学”意味着混乱与焦虑的升级, 然而, 在接下来的语言教学活动中, 这一混乱与焦虑被推向荒谬、可笑、绝望与狂暴的极致。

### 三、“语文学”如何导向“犯罪”

“算术导向语文学”是教授在数学教学失败后不得不做出的让步, 而“语文学导向犯罪”则始于对这一失败的教学方式的可笑延续与固守。

语文学课程伊始, 教授就宣称: “……只消一刻钟, 你就能掌握新西班牙语的语言学和比较语文学基

① Eugene Ionesco. *Four Plays*, p. 57.

② Eugene Ionesco. *Four Plays*, pp. 57~58.

③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第 20、21 页。

④ Eugene Ionesco. *Four Plays*, p. 58.

⑤ Eugene Ionesco. *Four Plays*, p. 59.

⑥ Michael Wreen, “The Logic of Ionesco’s The Less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1983, 7(2), p. 229.

本原理”<sup>①</sup>，并将语言和词的意义归结为两方面的精确掌握：第一，每个词的正确发声部位和发声方法；第二，每种语言所对应的事实存在物与事实经验。但教授津津乐道的仍是那些始终无法让人进入语言核心的规范，如：每个词的声音如何之轻盈以至于它们可以“……飞扬而不会被人忽略”<sup>②</sup>，词如何在身体器官里游走和迸发。而对于词的意义，教授认为它们只会使词变得沉重，使得词“总是被侵蚀而坠落”<sup>③</sup>。

尽管由算术的形式演算走向了离不开语义的语文学，但教授的教学逻辑并未根本改变。他关于语言学内涵的阐述不仅自相矛盾，而且单调重复，如他教给学生的对于一个语句意思的表达在各国语言中是毫无区别的。其语文学教学与数学教学一样，自始至终没有与活生生的“生活形式”相联系，始终陷入空洞单调、重复与仪式化的徒劳努力中。

更重要的是，教授的语文学是自我封闭的语文学，拒绝交流的语文学，甚至可看做强求一律的集权专制的语言形式。学生最初试图顺应教授的语文学教学，但后来剧情骤然发生转折。转折点是学生的牙痛。

在教授眉飞色舞的语文学授课过程中，学生开始感到牙痛。“牙痛”简洁而反复地表现为一个语言形式——“我牙痛(I've got a toothache)”。关于“疼痛”的语法分析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占据大量篇幅。在他看来，“我痛”的表述，其根本意义并非对一事实的描述，而是一种期待回应与交流的呼告。剧中，与授课内容反复交替出现的“我牙痛”的呼告，要求的是对疼痛者此刻身心感受的关注。而随着老师对它一次次的置之不理与无休无止、冗长繁琐的语言学讲解，“牙痛”已变成一种难以忍受痛苦的乞求，同时它也以自身逐渐增强的单调性和仪式化，同教授失败的教学方式形成倔强的对峙。

“我牙痛”在其深层语法意义上所要求的回应与交流，在教授那里一次次地被无视甚至扼杀。这种交流的失败，与教授不断大谈特谈各国语言的丰富性、独特性、重要性和语义逻辑的理想程度，形成极具嘲讽意味的对比。学生的牙痛呼告是交流的信号；教授却沉溺于封闭、单调、重复的语言学系统，并试图将这一系统强加于学生。看似在进行语文学教学，但学生和教授没有构成实质性的对话，而是两个格格不入的语言系统在对抗。学生的牙痛呼告由于得不到有效的回应，变成对教授讲课内容的条件反射，以及对教授系统规则的仪式化的抗拒。两者在非对话性的语言交替之中，执拗地冲突下去，并且节奏越来越快，内容越来越重复，情绪越来越焦躁，关系越来越紧张。犯罪是这一冲突的灾难性结果。

当“犯罪”的导火索——“刀”的语文教学活动时，它的意义就在教授和学生逐渐升级的对抗中浓缩在教授手里握着的刀上。与节奏越来越快的短促的“我牙痛”相交织的是，教授以同样短促有力的节奏反复念叨着“刀”的语音。

戏剧结尾处，与牙痛意象并置的是刀的突兀意象。耐人寻味的是，剧中“刀”的语文教学和“牙痛”呼告的对峙，具有鲜明的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色彩：刀和牙痛的对峙不仅是暴力与人道的价值对峙，也是传统语言哲学和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基本语言观念的对峙，是典型的“实指定义”和交流呼告的对峙。教授手持刀这一实物，不断重复发出“刀”的语音，正是退缩到传统语言观中最典型的实指定义——撇开任何语义联想、无视任何用法规则，直接以词指物。这意味着教授的语文学系统退守到传统语言观念的最后底线或最初基石：意义即对象。与此相对，学生反复的“牙痛”呼告，也是回到维氏后期语言哲学最基本的出发点：意义即用法；关于“我疼痛”的话语，首先是一种交流呼告而非指向内部疼痛的事实陈述。

由“刀”的实指教学，到用刀杀人的犯罪，意味着在最后的对峙中，教授的语言系统彻底崩溃。实指定义发生破裂，能指被抛弃，只剩下实指定义关系中纯粹的所指，或曰同语言脱节的对象，即手中握着的刀。教授用这个剥离了词的物(刀)彻底终结了女学生的交流呼告及其语言观念的执拗表达，或者说，用非语言的犯罪行为强行结束了两种语言系统的对峙。

①Eugene Ionesco. *Four Plays*, p. 60.

②Eugene Ionesco. *Four Plays*, p. 62.

③Eugene Ionesco. *Four Plays*, p. 62.

## 四、结 语

在剧名下方,当尤奈斯库把《上课》这个惊悚荒诞、血色淋漓的课堂故事界定为“a comic drama”——一部滑稽剧时<sup>①</sup>,也许很多读者会认为,这是尤奈斯库又一次在剧名的所指与能指上玩弄的“荒诞”游戏,因为“滑稽剧”惯有的轻松幽默与该剧残酷血腥的结局实难统一。

然而,当我们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意义上来重新审视作品,当我们把剧中的血腥与暴力、妥协与专制、迫害与“犯罪”置于语言习得规则和语言意义本质的分裂性上来理解,这部由数学和语言引起的“滑稽剧”,便超越了“误会”、“愚昧”、“丑陋”、“不合时宜”等传统喜剧主题,将维氏从语言哲学角度思考的“荒诞”困境作了某种颇具“生活形式”意味的演示。从这个意义上看,恶行的实施与其说是个人主观暴力冲动,不如说是对某种抛空了“生活形式”的“语言游戏”的绝对性的孜孜渴求所引起的荒谬后果。在它可怖、血腥的表层情境下,充满了人类自我反省式的嘲讽,以及思维无法在语言中实现自我超越的可笑与癫狂。

### Arithmetic, Philology and the “Comic Drama” about Crime: A Study of Ionesco’s Absurd Play *The Less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Wittgenstein’s Later Philosophy

Chen Xi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Eugene Ionesco’s *The Lesson* is a play full of elements of violence and absurdity as well as rich meanings in language philosophy. However, the usual interpretations of this play have focused more on the former, viewing it as a satire and critique on totalitarianism and its irrational mechanism, while paying little attention to its unique and profound connotations in language philosophy. An examination of the latter might form a significant literary correspondence to Wittgenstein’s later philosophy. Wittgenstein’s meditations and comments on meaning and use, on mathematical logic and experiential facts, on the grammars of “pain”, the “ostensive definition” and the “implied call for communications in a statement” in his later philosophy, are helpful in analyzing the failed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Lesson* and in elucidating the grotesque logic in this play which is “Arithmetic leads to philology, and philology leads to crime”. In this “comic drama” about crime, the absurd process and bloody end of arithmetic and philological teaching epitomize kinds of traps of thinking warned by Wittgenstein’s later philosophy, and further exhibit the deep conflicts in language and thinking underlying the confrontational relations in terms of power politics.

**Key words:** Ionesco; *The Lesson*; Wittgenstein; language learning; arithmetic; philology; crime

● 作者简介:陈 溪,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文学学院博士后;湖北 武汉 430072。

Email: glenbrook@163. com.

●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2 批面上资助项目(2012M521455)

● 责任编辑:何坤翁



<sup>①</sup>Eugene Ionesco. *Four Plays*, p. 43.